

# 朱光潜抗战时期在四川的美学研究

钟仕伦

摘要：抗战时期，朱光潜在内迁至四川乐山办学的武汉大学担任教务长的同时，坚持进行美学研究。国破家亡的社会现实的感悟和拯救民族危难的重任以及对进步思想和理想社会的追求，使朱光潜从西方美学转向中国传统美学的研究，并且把这种研究与他的高等教育教学管理实践结合起来，为抗战人才的培养做出贡献。朱光潜抗战时期的美学研究呈现出强烈的现实精神和知行合一的特点。从朱光潜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位经过欧洲现代美学培养和学术训练的美学家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关头的凛然正气，看到一个真正的学者的担当，其崇高的人格精神和丰厚的学术成就值得我们努力学习和继承发扬。

关键词：抗战时期 美学研究 人才培养 知行合一 崇高人格

作者钟仕伦，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成都 610066）。

## 一

抗战爆发，朱光潜历尽千辛万苦从北平辗转漂泊来到四川，先在四川大学任文学院院长，不到一年，因为不满国民党当局对学校的控制，离开川大，在友人的帮助下来到内迁至乐山的武汉大学任教，后担任教务长，在担任教务长的同时坚持进行美学研究。当时的条件十分艰苦，拿朱光潜自己的话来说，“这些文章大半在匆迫中写成的”，是他劳累了一天教务工作，“精疲力竭”，“在深夜里听着妻女打呼鼾写成的”。<sup>①</sup>乐山十年，武汉大学学生规模由600人增加到2000人，但国民政府的拨款却维持在原来的规模上，加之物价飞涨，给全校师生员工的教学科研和生活带来极大的困难。“教师的遭遇也一样，工资打折扣。学校又无力安排住房，全由老师向当

地人士或农民租借”。<sup>②</sup>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朱光潜以非凡的毅力和坚强的意志在保证完成繁重的教学管理工作的同时，完成了他一生最重要的代表作，不仅为中国美学留下了极为丰厚的学术成果，而且

- <sup>①</sup> 朱光潜在《谈修养》（1942年，乐山）的《自序》中说：“这些文章大半在匆迫中写成的。我每天要到校办公、上课、开会、和同事同学们搬唇舌、写信、预备功课。到晚上精疲力竭走回来，和妻子、女孩、女仆挤在一间卧室兼书房里，谈笑了一阵后，已是八九点钟，家人都去睡了，我才开始做我的工作，看书或是作文。这些文章就是这样在深夜里听着妻女打呼鼾写成的。”（朱光潜：《谈修养·自序》，《朱光潜全集》第4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5页）
- <sup>②</sup>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229页。

为中国美学留下了极为重要的精神成果，值得我们今天努力学习和继承发扬。

## 二

抗战时期，朱光潜在四川研究完成并出版了他一生最重要的著作《诗论》。朱光潜后来回忆说：“我的第一部美学著作是1936年出版的《文艺心理学》。《谈美》的信是概括这部处女作的通俗叙述。接着我写了一部《诗论》，对过去用功较多的诗这门艺术进行了一些探讨。”<sup>①</sup>从朱光潜的回忆可以看出，用西方美学理论来研究中国诗学问题，是他从一开始研究美学就立下的方向，而这本朱光潜在欧洲就草成纲要、“自认为用工较多，比较有点独到见解”<sup>②</sup>的《诗论》，则是在乐山武汉大学最终完成，1942年由战时首都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出版的。

谈到写作《诗论》的原因，朱光潜说，“在目前中国，研究诗学似刻不容缓”，原因是现在西方的诗歌作品和诗歌理论流传到中国来，为中西诗学比较提供了很多新材料，通过比较才能够看到中国诗学的价值。另一个是新诗运动正在中国兴起，“不能让它流产”。从朱光潜写于1942年的《诗论》抗战版序来看，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对中国文化命运和前途的担忧，骨子里是对抗战命运的担忧，表现出一个学者的爱国情怀。

朱光潜回国后先应胡适邀请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讲了一年的《诗论》。“每次演讲，（朱光潜）都把原稿大加修改一番。改来改去，自知仍是粗浅，所以把它搁下，预备将来有闲暇时再把它从头到尾重新写过”。<sup>③</sup>《文艺心理学》完成于1932年，是朱光潜“在外国当学生时代写成的……所以朱佩弦先生的序还是一九三二年在伦敦写成的”。<sup>④</sup>朱自清逝世后，朱光潜写文章悼念说，当年朱自清由清华休假到欧洲去，“我还在英国没有归来，在英国彼此又有一个短时期的往还。那时候，我的《文艺心理学》和《谈美》的初稿都已写成，他在旅途中替我仔细看过原稿，指示

我一些意见，并且还替我做了两篇序。后来我的《诗论》初稿也送给他，由他斟酌过”。<sup>⑤</sup>也就是说，朱光潜的《诗论》是他从留学欧洲就开始研究的问题，《文艺心理学》“泛论文艺，我另外写了一部《诗论》，运用本书的基本原理去讨论诗的问题。同时，对于中国诗作一种学理的研究”。<sup>⑥</sup>这些都说明《诗论》的确是朱光潜学术生涯中的一部重要著作，特别是朱光潜在《诗论》中提出的“超我之境”说和用克罗齐的“直觉”、“表现”说来研究情感与意象的关系，是继王国维之后对中国美学做出的重大贡献。<sup>⑦</sup>

## 三

朱光潜抗战时期在四川还写了一篇研究《乐记》的文章——《乐的精神与礼的精神——儒家思想系统的基础》，从这篇论文的副标题可以看出，朱光潜是想对儒家思想“一贯的系统”作总体上的把握，他自己说这篇文章是“重解说不重评判”，有点孔子“述而不作”的味道。从表面看，《乐记》编写的

- ① 朱光潜：《美学拾穗集·我是怎样学起美学来的》，《朱光潜全集》第5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347页。
- ② 朱光潜：《诗论》“抗战版序”、“后记”，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第2、287页。
- ③ 朱光潜：《诗论》“抗战版序”，第2页。
- ④ 朱光潜：《文艺心理学》，《朱光潜全集》第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197页。
- ⑤ 朱光潜：《敬悼朱佩弦先生》，《朱光潜全集》第9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488页。
- ⑥ 朱光潜：《敬悼朱佩弦先生》，《朱光潜全集》第9卷，第200页。
- ⑦ 克罗齐的“表现说”对朱光潜影响很深，许多年以后，他在评论朱自清的《诗言志辨》时说：“我认为古代所谓‘志’与后代所谓‘情’根本是一件事，‘言志’也好，‘缘情’也好，都是我们近代人所谓‘表现’。”（朱光潜：《朱佩弦先生的〈诗言志辨〉》，《朱光潜全集》第9卷，第497页）

目的是“记乐之义”，<sup>①</sup>即对音乐的意义、内容、价值和艺术特征的论说，实际上，《乐记》涉及的思想内容非常广泛，如乐与礼的关系、乐的起源问题、乐与诗歌和舞蹈及其德治的关系、音乐风格与接受者的心理结构变化关系，等等。可以这样说，一部《乐记》既是一部艺术哲学著作，又是一部政治哲学著作，也是一部伦理学专著。《乐记》的这个特点，在朱光潜的论文中得到了充分的“解说”。

朱光潜说：“一般人对于礼乐有一个肤浅而错误的见解，以为礼只是一些客套仪式，而乐也只是弦管歌唱。孔子早见到这个普通的误解，曾郑重地申明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在《礼记·孔子闲居》篇里，他特标‘无声之乐’与‘无礼之礼’。儒家论礼乐，并不沾着迹象，而着重礼乐所表现的精神。”<sup>②</sup>朱光潜认为，“儒家的全部哲学思想大半从乐与礼两个观念出发”，而“和”与“序”则为乐的精神与礼的精神，是儒家思想中的“两个伟大的观念”。由于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义”，因此，“和”与“乐”又统归于“仁义”，或者说，“仁义”思想是《乐记》的核心思想。这种看法揭示了《乐记》的深层内涵。朱光潜早年学过一些符号逻辑学的知识和方法，<sup>③</sup>他将这种知识和方法用于《乐记》的研究，从《乐记》的语言符号“乐”与“礼”“解说”出它的表层意义“和”与“序”及其深层结构“仁义”思想，这在《乐记》研究史上可以说是一个新的开端。

我们之所以说朱光潜的研究是《乐记》研究史上一个新的开端，其原因还在于，朱光潜虽然面对的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系统的问题，但他始终将《乐记》放在中西美学的大背景中来展开研究。例如，他用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思想中的“自由”、“和谐”来阐明《乐记》的“和”的观念，将《乐记》之“和”安放在个人的“内心和谐”与社会的“泰平和谐”之中，提出“一个有幸福的社会必然是一个无争无怨相安和谐群策群力的社

会”的观点，认为“儒家论诗乐特标‘道’的功用，实与亚里斯多德的见解不谋而合”。<sup>④</sup>朱光潜还用亚里士多德的“中”论和“宣泄与净化”、瑞洽慈的“组织”说、柏格森的“创化”说，甚至还从佛教、耶稣教、希腊的酒神、波斯的拜火教来论述《乐记》的“中和”与“礼治”的精神以及通过人的心理行为对社会产生的影响。

在中西比较的大背景中，朱光潜还用“节”、“养”、“文”三个儒家美学关键词对“礼”的精神作了阐释：“从‘序’与‘理’说，礼的精神是科学的；从‘义’与‘敬’说，礼的精神是道德的；从含四者而为‘文’说，礼的精神也是艺术的……所以礼融真善美为一体。儒家因为透懂礼的性质与功用，所以把伦理学、哲学、美学打成一气，真善美不像在西方思想中成为三种若不相谋的事”。<sup>⑤</sup>朱光潜的阐释隐含着康德对“人”的理性所作的知、情、意的三分法，这种“移西方美学之花接中国儒家传统之木”<sup>⑥</sup>的研究方法深化了自王国维以来的中国传统美学研究的新路径。

与此同时，朱光潜认为宇宙也有它的“序”与“和”，《乐记》的礼乐精神与自然现象紧密相关。礼涵盖个人与家庭、社会与群体、国家制度与典章仪式，可谓“一切文化现象的总称”，而且更重要的是，“礼是救时

① 孔颖达：《礼记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1583页。

② 朱光潜：《乐的精神与礼的精神——儒家思想系统的基础》，《朱光潜全集》第9卷，第94—95页。

③ 朱光潜：《乐的精神与礼的精神——儒家思想系统的基础》，《朱光潜全集》第9卷，第99页。

④ 朱光潜：《乐的精神与礼的精神——儒家思想系统的基础》，《朱光潜全集》第9卷，第96、101页。

⑤ 朱光潜：《乐的精神与礼的精神——儒家思想系统的基础》，《朱光潜全集》第9卷，第103页。

⑥ 朱光潜：《答郑树森博士的访问》，《朱光潜全集》第10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648页。

弊的一剂良药”。<sup>①</sup>从这里可以看出，朱光潜不是为研究《乐记》而研究，而是通过《乐记》的研究来针砭时弊，希望在抗战这一非常时期，全民族能够团结一心，共渡难关以抵御外侮，拯救民族与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讲，朱光潜的《乐记》研究既有现实价值又有历史意义，与他在同时期完成的《诗论》一道，代表着他的美学研究从西方美学向中国传统美学的转折，树立起一座中国传统美学研究的丰碑。套用郑昕当年评康德哲学的话说，研究中国美学的后继者可以超过这座丰碑，但很难掠过这座丰碑。

除了《乐记》的研究外，朱光潜在四川还写作了《谈修养》中的二十来篇文章。这些文章“万变不离其宗，谈来谈去，都归结到做人的道理”。他在《谈美感教育》中用《论语》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来证明“美育与民族兴衰”的密切关系。<sup>②</sup>特别是他在评价冯友兰先生《新理学》时所提到的“中国哲学旧籍里那一盘散沙，在冯先生手里，居然成为一座门窗户牖俱全的高楼大厦，一种条理井然的系统”的观点，<sup>③</sup>不仅高度肯定了冯友兰先生“新理学”对中国哲学的贡献，而且对我们研究同样是“一盘散沙”的中国古代美学极富启发性。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朱光潜抗战时期在四川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研究投入的精力比较多，但他一直没有放弃西方美学，特别是克罗齐的研究。我们知道，朱光潜的美学思想深受克罗齐的影响，他自己也在《文艺心理学》里的“作者自白”中说他对于克罗齐有一个从追随到怀疑的过程。克罗齐的哲学、美学和历史学的思想在朱光潜的美学著作中随处可见。抗战时期，地处乐山，几乎与外界完全隔绝，但朱光潜依旧继续进行克罗齐美学著作的翻译和关注着克罗齐美学研究的现状。当他在乐山看到老朋友梁宗岱就他的克罗齐研究而写的评论文章《试论直觉与表现》时，感到“很欢喜”，就梁宗岱对他的一些观点的误解作了回答，而这些回答都是他坚持数十年克罗齐研究的结果，重申了他运用王

安石诗和杜甫诗以及姚鼐论文和他自己的《诗论》论证克罗齐“艺术即直觉，即表现”的合理性，反驳了梁宗岱对他的误解和不恰当的批评。朱光潜说：“‘惟善人为能受尽言’，我这番话是一位老朋友以最诚恳的心肠向你说的，听起来也许不很入耳，但是我希望它可以产生良好的结果”。<sup>④</sup>克罗齐的美学思想几乎影响了朱光潜的一生，一直到1958年，他还给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写信请求出版“在当时是未定评的”克罗齐的《美学原理》，<sup>⑤</sup>而对克罗齐美学思想的基本观点则形成于抗战时期的四川乐山武汉大学。<sup>⑥</sup>

朱光潜抗战时期坚持进行中国传统美学研究的基础源于他当年在香港大学读书时所受到的教育。他说：“我记得很清楚，在初进大学时，我读得最多的是两汉以前的著作……我也很明了群经诸子与楚词汉赋的文章真茂美”。<sup>⑦</sup>他在抗战中能够将在欧洲留学所学到的哲学、美学、文学理论等知识运用到高等教育研究和管理工作实践，也与他在香港大学读书时对哲学和文艺的兴趣有关，而这个兴趣来自于朱光潜的老师奥穆先生。1944年春，朱光潜在乐山回忆说，是奥穆先生为他“种下了哲学的种子”，有奥穆先生的启发，“这二十多年来我时常在希腊文艺与哲学中吸取新鲜

① 朱光潜：《乐的精神与礼的精神——儒家思想系统的基础》，《朱光潜全集》第9卷，第106—107页。

② 朱光潜：《谈修养》，《朱光潜全集》第4卷，第4、149页。

③ 朱光潜：《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朱光潜全集》第9卷，第42页。

④ 朱光潜：《论直觉与表现答难——给梁宗岱先生》，《朱光潜全集》第9卷，第203页。

⑤ 《跨越数十载的大家情怀——“中国现代作家珍稀手迹展”侧记》，《光明日报》2015年5月12日，第7版。

⑥ 朱光潜《克罗齐哲学述评》的撰写和克罗齐《美学原理》译稿的修改（两书1948年由正中书局出版）都是在抗战时期的乐山武汉大学完成的。

⑦ 朱光潜：《就部颁〈大学国文选目〉论大学国文教材》，《朱光潜全集》第9卷，第124页。

的源泉来支持生命”。<sup>①</sup> 视异国哲学为自己的生命，这在朱光潜的人生中是一种类似宗教的虔诚，也是他抗战时期坚持进行美学研究的动力之一。自温克尔曼之后，黑格尔、荷尔德林、马克思、海德格尔等哲学家都对希腊哲学和艺术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崇高的敬意，其原因在于，希腊哲学和艺术给人以深刻的反思力和强大的生命感，“希腊意义上的最高理智就是反思力”，就是“美”。<sup>②</sup> 朱光潜正是依靠这种对“美”的追求来坚持进行美学研究。就抗战时期而言，朱光潜对希腊文艺与哲学、对克罗齐美学的研究为的是更好地研究中国传统美学，并且将这种研究的成果运用于抗战人才的培养，这使他的美学研究呈现出知行合一的特点。<sup>③</sup>

#### 四

有人说，朱光潜抗战时期转向中国传统美学研究、向中国传统寻找资源的原因是“受到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和与新儒家思想的接触。<sup>④</sup> 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完全准确。朱光潜抗战时期转向中国传统美学，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对因传统文化的丧失而亡国亡种的担忧和身体力行的抗战实践：“近代灭人国者，常竭力摧残其固有文化，其用心至毒而为计划至当……国家危亡之机，失教远胜于失政。”<sup>⑤</sup> 而要挽救国家危亡，必须培养抗战急需的人才，这与他担任武汉大学教务长，用进步思想来办学和实施教务管理的实践分不开。

1937年7月20日，朱光潜在四川大学总理纪念周大会上说，他喜欢清静，“对行政事务没有浓厚的兴趣”。在北京大学时，几次让他当西语系主任，他都没有答应。但是在全面抗战“这样环境底下，应当牺牲个人兴趣来干公家的事的。我这次冒然答应担任文学院的事，也是因为这点责任心”。<sup>⑥</sup> 他把出任武大教务长看成是“自己担负的神圣使命”。<sup>⑦</sup> 在乐山武汉大学，朱光潜先是担任外文系主任，1939年因武汉大学教务长周鲠生出席太平洋会

议而接任这一职位，从此任职到抗战胜利武大迁返。众所周知，大学的教学管理工作十分关键而且非常繁重，而朱光潜却在担任教务长的同时完成了他的代表著作，其主要原因在于他的美学研究与办学主张有着内在的关系。挽救民族危难和国家危亡，第一要务是兴教培养人才，特别是高等专业技术人才，而培养高等专业技术人才又必须以完美人格的塑造、进步理想的培养为首要目标。

抗战时期，朱光潜曾经想通过中国共产党在文化界的负责人周扬到延安去参加抗日

- ① 朱光潜：《回忆二十五年前的香港大学》，《朱光潜全集》第9卷，第187页。
- ② 荷尔德林说：“希腊意义上的最高理智就是反思力，而且，当我们把握了希腊人的英武形体时，我们就可以理解这一点了。”海德格尔对此解释道：“在这里，所谓‘反思力’的意思是：让一切在其本身中纯粹地闪现并因此而在场的东西重新闪现出来的能力。而在这种闪现中在场的东西就是美。”（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歌的阐释》，孙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92—196页）
- ③ 朱光潜对儒家知行合一的思想十分熟悉。他说：“知是道问学，是格物穷理，是注视事物变化的真相；行是尊德行，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在事物中起变化而改善人生……人生的最终目的在行，知不过是行的准备。”（朱光潜：《看戏与演戏——两种人生理想》，《朱光潜全集》第9卷，第258—259页）
- ④ 王攸欣：《朱光潜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56页。
- ⑤ 朱光潜：《政与教》，《朱光潜全集》第9卷，第91页。
- ⑥ 朱光潜：《在四川大学总理纪念周上的讲演》，《朱光潜全集》第8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566—567页。
- ⑦ 1941年3月，针对关于教育部抗战以来颁布的“统一招生”、“统一课程”、“导师制”新政令的争论说：“今日教育家最需要的不是制度方法上的新花样而是良心与自省，是彻底地认清自己在文化与教育上所站的地位，而忠实地果决地向前迈进，求完成自己所担负的神圣使命。”朱光潜1941年3月在《高等教育季刊》1卷3期上发表《从教育部的几种新政谈到功令与学风》。（《朱光潜全集》第9卷，第61页）

斗争，虽然阴差阳错，未能成行，但朱光潜追求进步理想，向往革命胜利的意志并没有销蚀。他一直认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正因为有这样的想法，朱光潜在乐山武汉大学，以国民政府举办的高等院校教务长的身份“大力鼓励学生认真读书，但也不反对学生从事进步政治活动。他曾为（有共产党员参加的）‘岷江读书社’、墙报《燎原》题词”。据当时的武汉大学校友回忆，朱光潜在乐山武汉大学与叶圣陶、彭迪先等联名发表宣言，参与了由中共领导的抵制国民党骨干程天放到校当校长的斗争。他甚至冒着坐牢的危险保护和营救进步师生，“抗战时期的武大发展了优良校风，开展了许多进步活动，这和朱光潜的办学思想和进步思想是密切相关的……朱光潜不愧是我国教育界办学的先驱，开拓中国学术研究的先进人物，也是引导青年认真读书，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良师”。<sup>①</sup>

武汉大学王星拱校长早年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经常来往，主张办教育要有长远的眼光，要有独立的精神。朱光潜的办学主张也与此紧密相连，最突出的是用中国古代儒家思想来建设良好的校风。他提倡“师生如父子兄弟”般的校风，唯其如此，方说得上是“人格感化”。很显然，朱光潜的办学主张实际上与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一脉相承。他在代国民政府教育部高教司起草的《升学指导》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各国文化与各科学术均有其固有之传统，以为向前进展之始基。无传统即无基础，墨守传统而不求进展，则固有者亦必寻至枯腐衰落。大学教育对于文化学术有两重任务：其一为对于已有传统加以流传广布，以维持历史的赓续性；其一则为从已有传统出发，根据新经验与新需要，孜孜研究，以求发展与创新。灌输与启发，守成与创新，缺其一，均不足与言完善的大学教育也。”<sup>②</sup>既然是全国高等院校的大学章程，武汉大学自然当为执行的表率。而他作为武汉大学的教务长，在教学管理与研究中注重传统和创新自然是题中之义。例如，他在武汉大学实施的培养具有“弘毅阔达胸襟抱负”

完美人格的人才培养方案就与“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吾善养吾浩然之气”、“阔达而多智”的儒家美学思想有关。挽救民族危难，建设富强国家，第一是人才的培养，而培养能够承担救国使命的人才必定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才。因此，朱光潜抗战时期的美学研究与他的高教管理实践有了实质上的结合。这是朱光潜抗战时期转向中国传统美学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朱光潜转向传统美学研究还间接地与他有意识地接触进步思想相关。朱光潜很早就接触到马克思的《资本论》，抗战中他又有意地宣传《资本论》。他应黄梅邀请，在《中央周刊》上刊登的为提升“现代公民常识”所开列的书目中，《资本论》赫然在目。<sup>③</sup>朱光潜认为，“马尔萨斯人口论与马克思资本论之说行，而俄国有共产革命”。他甚至认为，“近代国家教育制度与理想，英美与德日异趋，苏联亦别树一帜”。<sup>④</sup>马克思的理论和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对朱光潜的人生观触动很大。1939年，他给周扬写信说：“我这一两年来思想经过很大的改革，觉得社会和我个人都须经过一番彻底的改革。延安回来的朋友我见过几位，关于叙述延安事业的书籍我也见过几种，觉得那里还有一线生机。从去年秋天起，我就起了到延安的念头，

①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第226、226—232页。

② 朱光潜：《文学院》，《朱光潜全集》第9卷，第28页。

③ 朱光潜《人文方面几类应读的书》说：“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非本文范围所及。但有几部虽为科学专著而已成古典的书籍不能不约略提及，例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的《群己权界论》，里波、詹姆斯和弗洛伊德的心理著作，马克思的《资本论》，佛来柔的《金枝》(Frazer: The Golden Bough)，都有广泛的读者，并不限于专门家。”（《朱光潜全集》第9卷，第122页）

④ 朱光潜：《政与教》，《朱光潜全集》第9卷，第90、89页。

所以写信给(卞)之琳、(何)其芳说明这个意思。”<sup>①</sup>正是这种对进步理想的认同和对时局的清醒判断,使朱光潜改变了过去单纯做学问的想法,为抗战承担起培养人才的重任,而为着人才培养的目标和要求,促使朱光潜把精力更多地投入到中国传统美学。

第三个原因是抗战文艺论争的影响。抗战爆发,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与田汉以戏剧、茅盾以小说、夏衍以电影投入抗战一样,朱光潜则以美学研究和文艺批评为武器,在抗战历史上留下了永远值得纪念的功绩。朱光潜入川之日,正是抗战文艺界关于文艺的功利性、为艺术而艺术的论争开展之时,在“民族的命运,也将是文艺的命运”的时代大潮中,<sup>②</sup>朱光潜与千千万万知识分子一起,以笔杆代枪杆,用他的智慧和汗水,用他的研究成果和文章发动民众与青年,组织他们投入到抗战。朱光潜十分关心抗战时期的文学现象,对文坛上的不正之风给予严肃而科学的批评。他一方面对那些打着继承传统文学旗号,把持大学国学教席的学究所写的无病呻吟的古文、八股文、试帖诗一类的文章给予坚决批评;另一方面,对那些机械模仿、照抄照搬法国象征派、现代英美诗的作品和文人的做法也指出他们的弊端,并且从“中西语句构造习惯”、“文化背景和社会经验”的差异说明中国人很难用西方文学中的繁辞丽藻和所谓的“情调”来创作。<sup>③</sup>他竭力主张,应该从中国传统文学中吸取养料,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学,以之为抗战文艺的新鲜血液。积极参与抗战文艺的论争,为朱光潜美学研究的转向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第四个原因是对民间文艺的认同。入川后,朱光潜有意识地接触蕴涵着深厚的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民间文艺,他认为,民间文艺是现代文学发展的土壤。与朱自清一样,朱光潜对新文学和新的文艺理论的建设也主张吸收西方文学艺术的精华,“但是这种外来影响的吸收理应当经过谨慎地选择与长期的消化。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文学的风格形式生根于一个民族的思想习惯性格情调等等”。

朱光潜在这里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对民间传统审美意识的研究。他主张像顾颉刚那样,通过研究民间文艺“激发爱国热情”,同时兼顾到“艺术价值,那就更圆满了”。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朱光潜对民间文艺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在成都的书店里看卖唱本,在悦来园看川戏,在青羊宫花会上听相声、洋琴、大鼓。他认为,唱本与川戏虽“鄙俚粗俗”,但却有“伟大的势力”,“商店学徒、茶馆请客以至于人力车夫凡能识字者,莫不以看唱本去消磨它们的时光”。社会民众津津乐道这些民间文艺,其原因在于“它们的形式和技巧有长久的传统在后面,在一般民众心中生了很深的根蒂。如果我们接受这种根深蒂固的对于民众有吸引力的形式和技巧把鄙俚粗俗的内容换为新鲜精妙的,我相信民众对于文学的兴趣可逐渐提高,而文学自身也可以得到一种新的力量和生命”。<sup>④</sup>

从更宽一点的角度说,朱光潜抗战时期的美学研究之所以能够从单纯的学术探讨转向生活现实,从研究西方美学为主转向研究中国传统美学,其原因在于抗战烽火的淬炼和人生价值观的改变。朱光潜在四川不止一次谈到鄙视“清道夫”是“可耻的价值意识的颠倒”,他认为“清道夫”的地位胜过达官贵人。<sup>⑤</sup>贴近实践,主动投入时代洪流,特别是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学术才干不辞辛劳地

① 朱光潜:《致周扬》,《朱光潜全集》第9卷,第19页。

② 文天行:《中国抗战文学概览》,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30、128页。

③ 朱光潜:《流行文学三弊》,《朱光潜全集》第9卷,第24—25页。

④ 朱光潜:《文学与民众》,《朱光潜全集》第9卷,第17—18页。

⑤ 朱光潜在《有志青年要做中小学教师》中说:“我们羡慕那些在街上撒垃圾的朱门大户,而鄙视拿帚箕的清道夫。这是价值意识的错误”。(《朱光潜全集》第9卷,第136页)他又在《学业·职业·事业》中说:“一个误国的总统或部长实在抵不上一个勤恳尽职的清道夫。我们通常对于‘不才而在

为抗战培养人才，为大众、为青年的成长做学问，把自己的学术旨趣、专业知识和人生经验奉献给青年、奉献给社会、奉献给全面抗战的实际斗争，表现出一个知识分子崇高的道德境界。抗战时期，朱光潜在《中学生杂志》、《当代文学》、《当代文艺》、《大公报》等报刊上发表了许多针对青年人谈美、谈诗、谈婚姻、谈做学问、谈创作等方面的文章，这些文章言简意赅，深入浅出，在阐明一些美学理论观点的同时，更多地是引导、激励青年人打造一个健康的人生和健全的人格，为民族和国家的事业，为抗战作贡献。

一个人的学术取向和研究方向与其人生观紧密相连。固然有一些学科，比如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社会科学一些“冷门”专业的研究远离现实生活，但研究者在这些领域中能否持之以恒，能否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果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者对人生、社会和他人的正确看法与否。尤其是在与社会生活、人生修养密切相关的美学、教育学、文艺学等领域，研究者自身对人生的态度、对人生的价值、对社会和他人的看法更是直接而深刻地影响到他的学术问题的选择以及研究的水平。这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人品即学品”的问题。朱光潜用他的知行合一的美学研究给我们做出了最完美的解答。

朱光潜抗战时期在四川的美学研究是他学术生涯的一个高峰，也是他“执两用中”、知行合一研究特点的代表。他对中国诗论、《乐记》、陶渊明、冯友兰“新理学”、克罗齐美学的研究与他对高等教育性质的掌握、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规格和要求的制定、学分制管理，甚至与他对文科专业建设、课程设置、教师队伍建设、教材建设等这些必须而繁重的教学管理工作看起来没有多大关系，但我们从他论证文学院的专业课程设置、为国民政府教育部高教司起草的《升学指导》以及发表在报刊上的关于大学课程改革的文章中随处可以看到他在研究中国诗论、《乐记》、克罗齐美学的过程中所运用的方法及其成果。这种将哲学、美学、文艺学与高等教

育管理学，甚至是政治论争结合起来的研究方法，<sup>①</sup>固然与朱光潜的师范出身，当过小学教师、中学教师、高校教师、系主任、院长和教务长以及国民议政参政员的经历有关，但最根本的还是因抗战而改变的他对社会、对人生、对民众的看法，他对学术的热爱、对民族和国家命运的担当以及他对进步理想、合理社会的向往与追求。<sup>②</sup>

概而言之，抗战人才的培养、对进步理想的追求、积极投身抗战文艺论争和民间文艺的兴趣等诸多因素使朱光潜转向中国传统美学，并且把这种研究与抗战实践结合起来，表现出鲜明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

## 五

朱光潜抗战时期在四川的美学研究在他的学术生涯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具有奠

高位’者的阔绰排场备致欣羨，对于老老实实替社会造福的农工人反存鄙视。这是一种可耻的价值意识的颠倒。”（《朱光潜全集》第9卷，第151页）

① 1944年4月9日，朱光潜在重庆《大公报》上发表的《宪政促进与言论自由》一文中，将他引入并深入研究的亚里士多德的“宣泄说”运用于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中：“民族有民族的生机，生机都要借发泄才能发展。发泄就是活动，也就是创造。最显著的生机发泄是文艺创作，学术探讨与政治活动，这些都要从思想言论与行动两方面见出。一个民族能在思想言论与行动上活跃，就见出他们的蓬蓬勃勃的朝气。这股朝气是不应遏止的。”（《宪政促进与言论自由》，《朱光潜全集》第9卷，第174页）

② 例如，朱光潜原先对《世说新语》感兴趣，以为魏晋人物语言、行为风度足以为人榜样，他读了《论语》后，才发现《论语》中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才是值得学习的，《世说新语》之于《论语》，简直是小巫见大巫，而魏晋名士终未能“忘我”，亦终未能“忘物”，因而对魏晋清谈保持一种警惕：“在清高的烟幕下藏着一种颇不光明的动机。”（《谈谦虚》，《朱光潜全集》第9卷，第169页）



基性的意义。朱光潜关于美的本质的研究，重人生的美学思想的提出，融中西为一体的当代美学理论体系建设的提法，对“想象”、①“气势”、“神韵”、“气韵生动”②等中国美学概念、范畴、命题和规律的阐释，对中国诗论三大特点的概括，③对《乐记》与毕达哥拉斯音乐美学思想的比较，④等等，其理论萌芽或思想渊源，几乎都可以追溯到抗战时期在四川的美学研究。甚至可以这样说，朱光潜关于“美是主客观的统一”的观点，抗战以后的美学研究，包括他的《西方美学史》中，都有抗战时期美学研究的理论因子。例如，朱光潜在给国民政府教育部高教司关于哲学系人才培养的规格和要求的建议中提出，哲学“须分析知识之性质（认识论）与美感经验（美学）”。⑤这里的“美感经验”即“美学”的提法，虽然着眼点在哲学专业人才，但也可以看作朱光潜的美学研究对象的观点。这种观点显然与朱光潜对中国传统美学与克罗齐美学思想的融合分不开。从这个意义上讲，抗战时期在四川的美学研究是朱光潜整个美学思想的土壤和宝库，也是他学术生涯的一个高峰。朱光潜在这一时期将研究的重点从西方美学转向了以中国传统美学为主，将西方美学与中国传统美学相结合，这正是整个中国现代美学转型的根本所在。达到这个高峰的根本原因在于朱光潜对民族危亡的拯救和国家命运的担当。从这个角度说，朱光潜抗战时期的美学研究在中国现代美学学术史上具有典型性和启发性，而它所蕴涵的一个美学家、一个教育家（顺便说一句，我们对朱光潜的教育思想还研究得不多）对民族、国家和人民，对生命、未来和理想、对美学、艺术和教育所抱有的满腔热血，并为之所经受的困苦、危险足以让我们今天肃然起敬而又赧然汗下。朱光潜以他的坚韧和执着、正义和热血、知识和毅力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美学家博大的胸襟和为民族勇于献身、对国家高度负责的殉道一般的精神。

当朱光潜的书桌从华北平原“搬”到四川盆地以后，全民抗战的大后方为他的美学

研究创造了一种相对稳定的战时环境，但他并未安坐书斋，而是拿笔杆作刀枪，用教鞭为武器，自觉地投入抗战。特别可贵的是，在川十年，繁重的教学管理工作始终压在朱光潜的肩上，但他从未放弃美学研究，从未放弃参与文艺论争，从未放弃引导和激励青年走向健康人生，他将美学研究的成果运用到拯救民族危难的全民抗战斗中，为抗战胜利贡献了一个学者和教育家的全部力量。从朱光潜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位经过欧洲现代学术思想培养和训练的美学家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关头的凛然正气和学者的担当，也正是这样一种源于儒家实践理性和知行合一的忘我境界使他成为中国现代美学史上的一座高峰，成为一个“真正的学者”。

朱光潜抗战时期在四川的美学研究告诉我们，一个学者，只有当他与社会和时代保持密切的联系，当他把自己的学术专长和研究成果与民族兴亡和国家命运如脐带般地连在一起的时候，他的学术生命才会长青不老，他的学术成就才会彪炳千秋，与三光同辉，这是朱光潜抗战时期在四川的美学研究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责任编辑：俞武松〕

- ① 朱光潜：《形象思维：从认识角度和实践角度来看》，《朱光潜全集》第5卷，第470页。
- ② 朱光潜：《谈美书简》，《朱光潜全集》第5卷，第285—286页。
- ③ 朱光潜：《中国古代美学简介》，《朱光潜全集》第10卷，第559页。
- ④ 朱光潜：《整理我们的美学遗产，应该做些什么？》，《朱光潜全集》第10卷，第316页。
- ⑤ 朱光潜：《文学院课程之检讨》，《朱光潜全集》第9卷，第83页。

**Zhu Guangqian' s Aesthetic Research in Sichuan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Zhong Shilun • 36 •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in realizing the reality that his country was suffering from aggression and the nation was in need of salvation, and in pursuit of progressive thought and an ideal society, Zhu Guangqian turned his attention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aesthe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estern aesthetics. He combined his research with teaching manage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to train qualified personnel for the war. His aesthetic research in this period was strongly practical, showing a unity of knowledge and practice. As an aesthetician trained in modern European aesthetics, Zhu displayed righteousness at a time when the existence of the Chinese nation imperiled, and his undertakings showed the merit of scholar.

*Children' s Literature in Focus*

**"Waterside" Boy and the Conjunction of "Water," "Fire" and "Soil": The Multiple Meanings of the "Scenery" in "Cao Wenxuan' s New Novels"**

Xu Yan and Guan Haichao • 45 •

Cao Wenxuan' s new novels take the form of "bildungsroman," which has not only shaped the peculiar "scenery" of the "waterside" boy but also demonstrated some changes in aesthetic style of the core "scenery" of "water." Cao Wenxuan' s new novels relate the image of "waterside" boy with three different aesthetic "sceneries" of "water," "fire" and "soil," and thus explored the new way of Chinese bildungsroman in the new century. These new changes actualized the compatibility of classical, modernist and realistic aesthetic spirits in the sense of literary history, carrying on the mission of the times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new century with "remedial" aesthetic thought.

**Writing of Childlike Innocence and Style Exploration: Reflection on Zhang Wei' s Recent Work of Children' s Literature**

He Zhongming and Liu Wenxiang • 57 •

Since 2011, Zhang Wei has created many fairy tales, which have become a significant feature of his writing style. These works follow the general narrative mode of children' s literature, with structures and themes that are relatively simple, and reflecting on childlike innocence as well as the essence of purity and moral beauty with an idealistic color. Seemingly, his fairy tales differ greatly from his previous works, but it is the continuation of his previous self. It implies not only an epistemic change in Zhang Wei' s writing, but also pushes the writing of folk, nature, and morality to a new stage. Of course, Zhang Wei' s creation of children' s literature can also be seen as an escape out of the hardship and fatigue of long-term pure literary creation. It represents the artistic freedom and indulgence of his spiritual world.

**Explorer in a Fantasy World: On the Genre and Anti-Genre of Yang Peng' s Children' s Fantasy Literature**

Cui Xiping • 65 •

Yang Peng is highly recognizable among the majority of realistic writings in the field of children' s literature. He calls for "defending imagination," and devotes himself to the development of fantasy worlds. His creations show different features, such as "lifestyle fantasy," "science fantasy" and "carnival fantasy." His books are sold cumulatively tens of millions of copies and have won more than 20 national awards. His opinions on industrialization and genres of children' s literature, makes him relatively distant from the circle of children' s literature. He is well versed in various genres of literary creation. His works not only are reader friendly but also bear criticism toward reality through the means of exaggeration and parody. The consideration on childlike innocence coexist with the amplification of fantasy. There is also a potential of anti-genre, critically reflective, and literary quality in his works, which has granted his works profound meaning and unfettered form.

*Writer' s Notes*

**Born by the Water: About My Literary Creation**

Cao Wenxuan • 76 •